

作為古董的定窯瓷器

定窯鑑藏史小議

李 鑫

定窯在宋金時期的發展盛極一時，在宋代皇家和文人士大夫的推崇下，成為宋代清雅藝術的典型代表。其在元代終燒後，又由於其在文人心目中的獨特地位，逐漸成為古代表瓷器藝術品收藏中最重要的一支，經元明而逐漸確立其「宋代名窯」的地位。明人的收藏觀念經清人繼承弘揚，在清末民國時期定型。定窯被列入「宋代五大名窯」的收藏觀即沿著這一脈絡形成。

唐、五代定窯創燒與早期發展

定窯自中晚唐創燒以來，迅速成為精細白瓷生產的典型代表，區別於化妝白瓷。其產品在晚唐、五代時期即作為貢御產品為宮廷、官府使用。河北省曲陽縣原慧炬寺立於永貞元年（八〇五）的《唐恒嶽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圖一）表明定窯在

唐中期已存在著規模與質量頗為可觀的製瓷業，形成陶瓷商品生產基地，還能生產「細茶器」一類的高檔日用瓷，並且已是政府派官監燒的供御窯廠。（馮金忠，《故宮博物院院刊》，二〇一三年三月）立於後周顯德四年（九五七）的《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記碑》（圖二）碑陰所記「使押銜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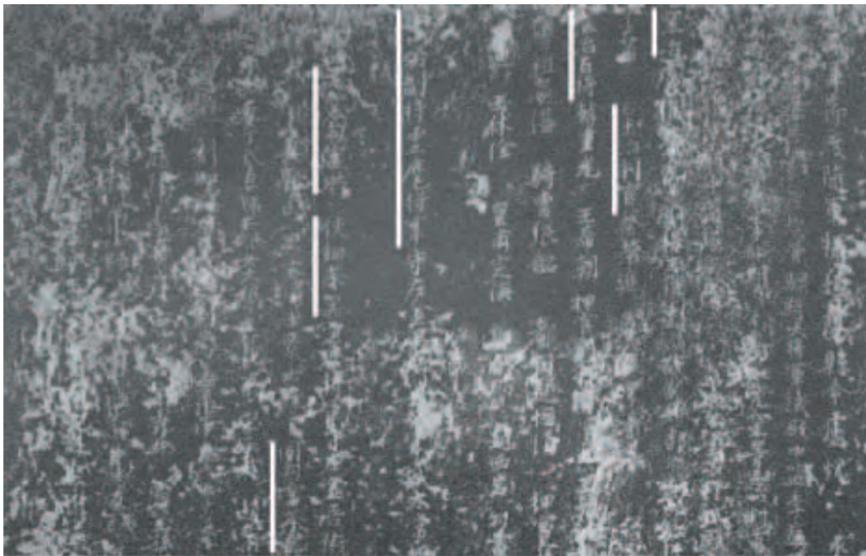
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殿中侍御史充龍泉鎮使鈐轄瓷窯稅務使馮翱」的碑文（註一），說明五代後周時瓷窯商稅務使在龍泉鎮收稅的情況，也表明當時定窯已具備相當的燒造規模。

宋金宮廷與文人士族對定窯的推崇

定窯的流行與宋金宮廷和上層文人的喜愛密不可分。宋代的官方文獻明確記載這時期定窯是貢御產品。《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二之三七：「瓷器庫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饒州定州青州（疑行）白瓷器以給用。…真宗景德四年（一〇〇七）九月，詔瓷器庫除揀封樁供進外，餘者令本庫將樣赴三司，行人估價出賣。其漆器，架閣收管，品配供應，準備供進及權場博易之用。」值得注意的是，兩宋一些文人筆記中提及「定窯白瓷有芒不堪用」，指出徽宗政和年間定窯即停止貢御。如顧文薦《負暄雜錄》：「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又陸游《老學庵筆記》：「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這些記載與實際不符，有學者早就提出了質疑。（蔡汝芬，《故宮學術季刊》第十五卷第二期）考古發現也證實，在直到北宋為金所滅的靖康二年（一一二七）之前，定窯依然作為貢瓷為宮中所用，且與皇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圖三、四）宮廷之外，定窯器物以



圖二 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記碑 河北省曲陽縣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藏



圖一 唐恒嶽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碑陰拓片 引自王麗敏、田邵品，《曲陽發現《唐恒嶽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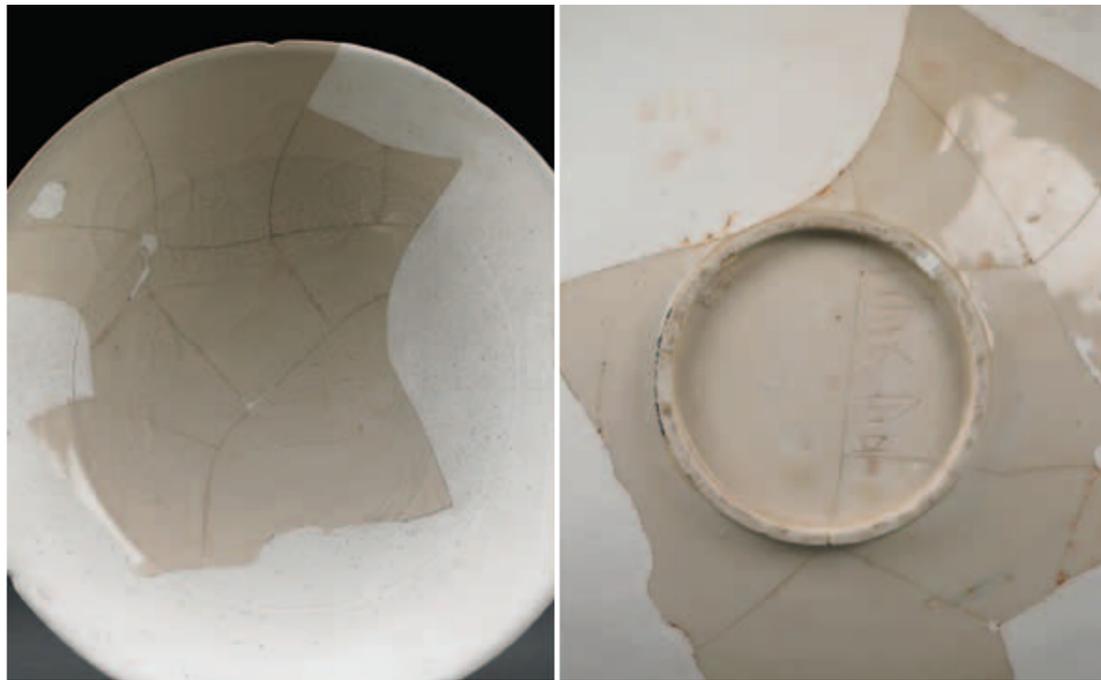
圖三 北宋晚期 定窯白釉「尚食局」銘劃花龍紋碗 2009河北曲陽縣定窯遺址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圖四 北宋晚期 定窯白釉「尚藥局」銘盒 2009河北曲陽縣定窯遺址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圖六 北宋晚期 韓琦家族墓地出土定窯白瓷 引自《安陽韓琦家族墓地》，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圖七 金代後期 定窯白釉「東宮」銘刻花龍紋盤 2009河北曲陽縣定窯遺址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圖五 北宋晚期 陝西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定窯白瓷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引自《異世同調—陝西省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北京：中華書局，2013

其精美的工藝和素雅的特徵，逐漸受到宋朝文人士大夫階層的喜愛，到北宋後期逐漸成為文人追逐的時尚，陝西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圖五），河南安陽韓琦家族墓地（圖六），都出土了相當數量的定窯瓷器，足見宋代士大夫階層對定窯的喜愛。定窯也是在宋代各窯中時人記載最多的一個窯口。

文獻記載也表明金代定窯貢御。《大金集禮》卷九公主條：「天眷二年（一一三九）奏定公主禮物，依惠妃公主例，外，成造衣襖器用等物：大物三百段疋，定磁一千事。」定窯遺址出土「東宮」款龍紋大盤（圖七）即金代貢御瓷器的代表。南宋的皇室和士大夫也依然不減對定窯的喜愛。近年來在杭州發掘的一些皇家和官方遺址出土了不少定窯瓷器，如南宋太廟遺址（圖八），臨安府衙署遺址（圖九），恭聖仁烈皇后宅（圖十）和高宗退位後居住的德壽宮遺址等等，在南宋的地層中都出土了一些定窯瓷器，許多瓷器還帶有宮廷使用的款識。（註二）南宋境內出土的定窯



圖九 南宋 臨安城衙署遺址出土定窯白瓷 引自《南宋臨安府治與府學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以磁，有若中原定磁者。」可見歸降的「漢地」之人對於定瓷並不陌生。定窯在文人心中依然有很重要的地位。刊行於至大年間（一一三〇—一一三一）劉祁《歸潛志》聯句亦詩中難事條：「與屏山、張仲傑會飲，坐中有定磁酒甌，因為聯句，先子首唱曰：『定州花瓷甌，顏色天下白。』諸公稱之。」元代一個重要的變化即定窯終燒後，定瓷作為「古董瓷」呈現在世人面前。孔齊《靜齋至正直記》卷四莫置玩器條：「義興王仲德老先生，平日誠實喜靜，惟好蓄古定、官窯、剔紅、舊青、古銅之器，皆不下數千緡，及唐、宋名畫亦如之，獨無書冊法帖耳。」將定瓷與古銅器、唐宋名畫並論，足見當時已價格不菲。同書窯器不足珍條：「在家時，表兄沈子成自餘幹州歸，攜至舊御土窯器徑尺肉碟二個，云是三十年前所造者，其質與色絕類定器之中等者，博古者往往不能辨。」又「饒州御土」條：「每歲差官監造器皿以貢，謂之御土窯，燒罷即封土，不敢私也。：甚雅薄，難愛護，世亦難得

產品，除了宋人南逃和宋金報聘通使時所攜，大量的定瓷產品當是在「隆興和議」（一一六四）後通過宋金間的權場貿易向南方輸出。（註三）在此之前，仿製品已適應市場需求開始出現，而定瓷作為前朝「古物」的概念也在此時形成。周輝《清波雜誌》卷五定器條記其淳熙五年（一一七八）左右隨使出金時所見：「釋出疆時，見虜中所用定器，色瑩潤可愛。近年所用，乃宿泗近處所出，非真也。」又南宋中後期《百寶總珍集》卷九古定條：「古定從來數十樣，東京喬位最為良，近者粉色皆不好，舊者多是不圓全。古定土脈好，唯京師喬娘

子位者最好，底下朱紅，或碾或燒『喬』字者是也，器物底有蚩虎者多好，如有淚痕者，多是紹興年間器物，不甚舊。」這一方面表明當時社會上對於定窯瓷器的極珍視，同時也指出，早至南宋初年紹興朝就出現許多北宋最精美的定窯產品的仿製品，故京喬娘子販賣的定瓷（圖十一）即在其列。

元代定窯鑑藏風氣的發展

元代宮廷尚金銀器，瓷器在元代時並不受主政者的重視。（註四）但不能排除蒙古軍隊攻下汴京與臨安城時將金與南宋的宮廷圖書、收藏



圖八 南宋 臨安城太廟遺址出土定窯白瓷 引自《南宋太廟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等據為己有。《元史》卷一百四十七列傳第三十四（張柔傳）：「崔立以汴京降，柔於金帛一無所取，獨入史館取《金寶錄》並祕府圖書。」又《元史》卷九本紀第九（世祖六）：「伯顏入臨安，遣郎中孟祺籍宋太廟四祖殿，景靈宮禮樂器、冊寶暨郊天儀仗，及祕書省、國子監、國史院、學士院、太常寺圖書、祭器、樂器等物。」人們對定瓷珍視、喜愛的態度也並未因宋金滅亡而中斷。元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載其師長春真人邱處機壬午（一一二二）六月於邪裡思幹（今烏茲別克撒馬爾罕）所見：「國人皆以鎗石、銅為器皿，間



圖十二-2 白釉印花纏枝花鳥紋盤 新安沉船出水 韓國國立光州博物館藏 引自《新安船（白瓷/其他）》



圖十二-1 白釉印花纏枝花卉紋盤 新安沉船出水 韓國國立光州博物館藏 引自《新安船（白瓷/其他）》，木浦：國立海洋遺物展示館，2006



圖十二-3 白釉印花折枝花卉紋盤 新安沉船出水 韓國國立博物館藏 引自《新安海底遺物（綜合篇）》，首爾：書籍株式會社，1988



他窯場生產的仿定器。傳南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錦》因其「五絕」條中所記「元曲」而被認為不會早至南宋。（註六）書中「天下第一」所列陶瓷產品中僅「定磁」與「高麗秘色」，並言「他處雖效之終不及」，可旁證新

安船出水三件「定窯瓷器」及七件高麗青瓷是作為稀有物品運往日本的。日本這一時期文獻中也多次提到定窯瓷器。如鎌倉—南北朝時代虎關師練（一二七八—一三四六）《濟北集》中詩：「定州白瓷陶冶珍，縱橫小理



圖十 南宋 臨安城恭聖仁烈皇后宅出土定窯白瓷 引自《南宋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圖十一 北宋晚期 定窯白釉「喬位」銘劃花畫虎紋平底碟殘片 2009河北省曲陽縣定窯遺址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大約從元代開始，傳世定窯瓷器及一部份仿定瓷被作為古董定瓷向海外出售，日本是主要的目的地。沉沒於至治三年（一三二三）的新安船（註五）出水三件定窯類型的白瓷（高美京，《故宮博物院院刊》，二〇一三年五月），據筆者觀察，這三件均非定窯生產（圖十二），而是景德鎮及其

佳者。」但即使「博古者往往不能辨」卻也只是「其質與色絕類定器之中等者」，雖孔齊從瓷器仿燒、作假的角度認為「窯器不足珍」，但足見定瓷之珍貴。



圖十四 定窯白釉盤口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窯為最好，然難得成對者。有花者曰藍定，出南渡後，然按東坡試院煎茶詩云，定州花瓷琢紅玉。則有花者非至南渡後而出也。北貴於南，定窯土脈細，有光素、凸花、劃花、印花、繡花等種，多因牡丹、萱草、飛鳳，式多工巧，劃花最佳，素者亦好，以白色而滋潤者為勝，白骨而加以釉水有如淚痕者佳，質粗而色黃者低，土俱白者，其價高於白定，間有紫定色紫，黑定若漆，不甚珍也。」基本上是明清時期對於定窯的認識水準。令人不解的是對紫定、黑定的評價。清藍浦《景德鎮陶錄》卷六〈鎮仿古窯

考〉定窯條：「間造紫定、黑定，然惟紅白二種當時尚之。」將「紅定」單列一種實為當時人認識的局限，其與紫定當均指定窯的不同色調的醬釉瓷器。（圖十三）《博物要覽》：「其紫黑者亦少有，餘僅見一二種。」明項元汴《歷代名瓷圖譜》：「定窯白色居多，紫墨之色恒少，至於墨色，尤為罕見。余生平所見定器，白色者百餘，紫色者數十，墨色僅見此一種。」今所見福開森《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雖被認為偽書，卻也可備參考。乾隆《御製詩》四集卷之十癸巳（一七七三）〈詠

定窯瓶子〉：「空傳紫色及黑色，那辨宣和與政和」（圖十四），又四集卷之三十一乙未（一七七五）〈詠定窯覺蓮盤〉詩後自註：「東坡詩：『定州花瓷琢紅玉』，今定窯絕無紅色者，故俗謂至粉定而暗花者，多則合『花瓷』之謂矣。」可見明清時期上述兩種釉色的定瓷已相當罕見，或可推測為對其評價極低的原因之一。乾隆所說花瓷即白釉暗花者的認識在當時也具代表性，萬曆間黃一正《事物紺珠》：「古定窯，白色；定州花瓷，白色。」又清佚名《南窯筆記》載：「出北宋定州造者，白泥素描，



圖十三 北宋中期 定窯醬釉碗 2009河北省曲陽縣定窯遺址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自然新。掃清仙客閑天地，貯得四時一味春。」傅虎關師鍊《異製庭訓往來》中提到「建盞 油滴 天目 饒州碗 定州」。南北朝—室町時代義堂周信（一三二五—一三八八）《空華集》中詠及「故人贈我定州瓷，中有蛟龍弄水嬉，祇恐一朝得雲雨，青天飛出碧瑤池。」對定瓷的收藏和喜愛在日本國也漸成風氣。

明清定窯鑑賞觀的成型

明清是定窯鑑藏觀的一個成型時期，其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一是對傳世定窯特點及真偽辨

別的總結及對定窯地位的評定。明初曹昭《格古要論》卷下《古窯器論》古定器條：「古定器，土脈細，色白二滋潤者貴，質粗而色黃者價低。外有淚痕者是真，劃花者最佳，素者亦好，繡花者次之。宣和、政和間窯最好，但難得成對者。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價高如白定，俱出定州。東坡詩云：『定州花瓷琢紅玉。』凡窯器有茅篾骨出者價輕，蓋損曰茅，路曰篾，無油水曰骨，此乃賣骨董市語也。」嘉萬時期張應文《清秘藏》卷上論窯器條：「定窯有花素、凸花二

種，以白色為正，白骨而加以釉水有如淚痕者佳。間有紫色者、黑色者，不甚珍也。」天啓年間谷應泰《博物要覽》：「（定器）其紋有畫花、繡花、印花三種，多因牡丹、萱草、飛鳳三種，時造甚有佳器，式多工巧。開列如後。獸面彝爐、子父鼎爐、獸頭雲板腳桶爐、膽瓶、花尊、花觚、合子內有三四寸者、孩兒持蓮葉枕、長樣兩角碟、四角蓮瓣碟、洞賓觀音像、水中丞、各種瓶罐、燈檠、大小椀、酒壺、茶注、蟾蜍注、瓜注、茄注、菖蒲盆底、坐墩、花囊，以上諸器皆定器上品。定窯器皿，以宣和政和年造者佳。時為御府燒造，色白質薄，土色如玉，物價甚高。其紫黑者亦少有，餘僅見一二種。其器色黃質厚者，下品也。又若古色青潤如油灰者，彼地俗名後土窯，又其下也。」基本抄錄萬曆時期高濂《遵生八箋》，代表了明人對定窯的認識。清唐秉鈞《文房肆考圖說》彙總之前的觀點云：「古定器宋時所燒，出定州，今直隸真定府也，似象窯，色有竹絲刷紋者曰北定，以政和、宣和間



圖十七 北宋晚期 定窯白釉蟠螭紋鼎式爐 2009年河北省曲陽縣定窯遺址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宋定窯仿古文王鼎：余獲觀於晉府宮中。」又「宋紫定窯蟠螭壺：余見於江右王府。無計得之。」書中著錄幾件定窯仿古銅禮器。(圖十五)高濂《遵生八箋》「論定窯」也提及：「如歌面彝爐、子父鼎爐、獸面雲板脚桶爐、膽瓶、花尊、花觚，皆略似古製，多用己意，此為定之上品。」這類產品在傳世品中不多見(圖十六)，相較官窯、龍泉產品較少為人所知。考古發掘中發現這類產品(圖十七)，式樣及數量較多的產



圖十六 定窯白釉獸耳瓦紋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校注項氏歷代名瓷圖譜》著錄定窯仿古銅文鼎

有涕淚痕者佳，有印花、拱花、堆花三種，名定州花磁是也。」但從前述《景德鎮陶錄》所記來看，在清代對「定州花瓷」的認識已有了分歧。

不同於鈞窯，定窯在明清瓷器收藏中地位一直很高。(秦大樹，《故宮博物院院刊》，二〇〇二年五月)《清秘藏》：「論窯器必曰『柴汝官哥定』。給予定窯很高的評價，後世所謂『五大名窯』在此時已初備雛形。高濂《遵生八箋》「論官哥窯器」：「高子曰：論窯器必曰柴汝官哥。」定窯列於之後，專闢為「論定窯」。萬曆時期張謙德《瓶花譜》：「尚古莫如銅器，窯則柴汝最貴，而世巨絕無之。官、哥、宣、定位當今第一珍品，而龍泉、均州、章生、烏泥、成化等瓶亦以次見重矣。」窯器中定窯與官、哥、宣窯僅次於柴窯，為「當今第一珍品」。這種觀念在明後期文人清賞類著作的相互傳抄中基本成為共識，清人認識大體相沿。乾隆《御製詩》五集卷之二十八丁未(一七八七)〈官窯小瓶〉：「宋時秘色四稱名」，下註「謂汝官哥

定」。《南窯筆記》載：「官窯：柴汝官哥定龍泉宣成嘉萬維宋明十大窯，蓋以諸器畢製，命官尚督之。」更是將定窯列為宋官窯。晚清寂園叟陳瀏《陶雅》「古器之存於今世者，在宋曰均、曰汝、曰定、曰官、曰哥、曰龍泉、曰建。」許之衡《飲流齋說瓷》概說第一中：「『吾華製瓷』可分為三大時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窯有五，所謂柴、汝、官、哥、定是也。」今所謂「宋代五大名窯」也被明確提出。

二是皇室貴族的大力推崇，至乾隆皇帝達到頂峰。明代宮廷定瓷收藏，傅呂震《宣德鼎彝譜》卷一中所錄為造宣德爐於宣德三年(一四二八)聖諭：「數目多寡，款式巨細，悉仿《宣和博古圖錄》及考古諸書，並內庫所藏柴、汝、官、哥、定各窯器皿，款式典雅者，寫圖進呈，開冶鼓鑄。」此書雖為明後期偽作，依然可以旁證明代宮廷的大量宋瓷收藏。(註七)諸王府中亦藏定瓷。項元汴《歷代名瓷圖譜》共著錄十一件定器，數件藏於王府之中，如

品集中於北宋晚期地層中，且一直延續至金代後期。兩岸故宮所藏奩式爐(圖十八)，過去多認為是北宋定窯產品。相同的產品出於長沙楊家山南宋咸淳六年(一一七〇)王趨墓(圖十九)，窯址發掘中也證實這類產品的時代為金代後期。(圖二十)清代宮廷對古瓷收藏風氣更甚，除繼承自明代宮廷的舊藏，另有大量買入者，這種情況在乾隆朝達到頂峰。乾隆皇帝個人的鑑賞觀受明人影響很大，尤其是高濂《遵生八箋》。(註八)其給予定窯很高的評價，如《御製詩》三集卷之七十一戊子(一七六八)〈詠陶器瓶〉：「窯瓷珍汝定，大略如推輪。」又卷之七十四戊子〈定窯磁枕〉：「磁中定州猶推輪」。乾隆詠瓷詩中，提及定窯的次數僅次於官窯，遠高於其他諸窯。從乾隆對定瓷的認識也反映其鑑賞水準的提高及其一些獨到的見解。如《御製詩》二集卷之四十三壬申(一七五二)〈宋瓷臂攏〉：「是時設有修內司，官汝均定精為瓷。」而五集卷之三十六戊申(一七八八)〈詠定窯膽瓶〉云：

「定冶非關修內司」，顯示其認識的進步。另如前述乾隆認為「今定窯絕無紅色者」，又《御製詩》四集卷之五十七〈詠定窯素鏡〉詩後自註：「定窯皆白，從無見他色者，東坡詩云：『定州花磁琢紅玉』，豈當時原有各色者乎？」可見其謹慎的態度。但其依然未超出當時一些局限，例如其將多件後仿或他窯的器物當作定窯。又如其多次提到「定瓷有芒不堪用」的觀點，但又言：「爾時雖是厭光芒，不及官窯用廟堂。歲久光芒銷以盡，希珍今亦口金釧。」(五集卷之三十一戊申〈詠定窯小盃〉)，「不及官窯用廟堂」，超出時人對「定瓷有芒不堪用」的理解，是其獨到之處。當然對乾隆皇帝來說，除了對古物的喜愛，其包括定瓷在內的陶瓷等收藏，事實上包含著乾隆皇帝的政治理想與訴求。(註九)

三是古董定瓷的高價買賣。《格古要論》所載即反映了元明之際的古董市場中定瓷買賣的一般狀況。明中期王佐增補《新增格古要論》不同之處是提到紫定、黑定「價高於白

察發現定窯遺址所在，其後又經歷了多次的考古調查與發掘，以及眾多遺址、墓葬、塔基等定窯資料的出土，對定窯的研究才逐漸脫離傳統鑑藏觀念的束縛，許多只通過傳世品無法解決的問題才逐漸清晰。但明清以來形成的「名窯」鑑藏觀的影響依然存在。民國二十三年刊行吳仁敬、辛安潮《中國陶瓷史》：「當時瓷藝即精進如斯，故官窯輩出，私窯蜂起，其間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鈞等名窯。」其說為民國三十一年趙汝珍《古玩指南》抄錄，



圖二十 金代後期 定窯白袖壺式爐 2009河北省曲陽縣定窯遺址出土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圖十九 定窯白袖壺式爐 湖南長沙楊家山南宋咸淳六年王趨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館藏 引自《中國出土瓷器全集（湖北湖南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圖十八 定窯白袖壺式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定」。極可能反映了定窯黑釉、醬釉瓷器在古董市場中的價格變化。《歷代名瓷圖譜》中指出許多當時人對於瓷器的收藏熱情，定窯的價格也

極高。如「宋定窯仿古蟬紋鼎……余以十金購之於京師報國寺骨董家。」又如「宋紫定窯蟠蚪罍……余以玉杯一隻易得於吾鄉李良實孝廉家。」許次紆《茶疏》：「茶甌，古取建窯兔毛花者，亦門碾茶之用宜耳，其在今日純白為佳兼貴於小，定窯最貴，不易得也。」明末張岱《陶庵夢憶》卷六仲叔古董條載「得白定爐、哥窯瓶、官窯酒區，項墨林（即項元汴）以五百金售之，靜曰：『留以殉葬』。」均可證。陳繼儒《妮古錄》：「余秀州買的白定瓶，口有四紐，斜燒成『仁和館』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書。」此類帶「仁和館」的四系瓶，實為十三世紀後期彭城窯產品（彭善國，《中原文物》，二〇〇四年六月）。但其表明當時古董商將他窯產品標榜為定窯以高價出售，以及許多收藏家對定窯認識的局限。

四是定窯的仿燒。定窯在明清的仿製，一方面是景德鎮御窯（器）廠仿燒，源自宮中對定窯的喜愛。《景德鎮陶錄》卷三〈仿古各釉色〉：「白定釉，有粉定、土定，廠止仿具

將柴窯剔出，定窯更名列第一。至二十世紀後半葉，「汝官哥定鈞」即所謂「宋代五大名窯」被明確提出，影響至今。這一說法從古董收藏的角

粉定一種。」另一方面民間仿燒，這是由當時的收藏風氣及古董瓷高價買賣催生的。《遵生八箋》：「近如新仿定器，如文王鼎爐、獸面戟耳彝爐，不減定人製法，可用亂真。若周丹泉，初燒為佳，亦須磨去滿面火色，可玩。」《博物要覽》錄其說。當時仿燒古定成風，甚至出現了如周丹泉（時臣）這樣仿燒的名家。《南窯筆記》載：「今南昌做者滑石合泥作骨子，純用礮子釉，不減古釉，花樣精緻過之。」晚清許之衡《飲流齋說瓷》談及定窯仿製：「偽者之釉或大混，或太乾或大透亮，或大間淡，萬難如舊者之潤亮也。……明代成化仿者亦佳，乾隆以後遂無仿之者矣。」民間的仿品往往也被好事者進貢，成為清宮舊藏的一部分。

「名窯」地位的最終確立

明清時期的瓷器收藏風氣到民國愈演愈烈，這直接導致了古董商人主導的大規模的瓷片盜挖，一大批遺址（如鉅鹿古城）、窯址被發現。上世紀二十年代葉麟趾先生通過實地考

度出發，頗有不合理的成分，但定窯以其在中國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宋代名窯」稱之卻也十分恰當。

作者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生

註釋

1. 該碑碑額題刻「大周王子山禪院長老和尚舍利塔之記」，《光緒重修曲陽縣志》志錄有全文，參見（清）董濤撰，周斯德修，《光緒曲陽縣志》，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曲陽小學堂本。該碑現存於定窯文保所展廳內。陳萬裡先生《邢越二窯及定窯》（《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三年九月，頁九一—一〇六）一文中曾結合此碑對定窯五代時期的生產狀況進行過探討，將「王子山院」訛為「五子山院」。該處錯誤在該篇文章與陳萬裡先生其他陶瓷考古文章一同結集出版時修正，參見《陳萬裡陶瓷考古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一六三—一七一。筆者推測，早期稿件為手寫投遞，「王」與「五」的書寫過程中互相混淆是經常發生的。這一錯誤影響甚大，包括馮先銘、謝明良、愛宕松男諸位先生在引用時都直接沿襲陳萬裡先生文章中這一錯誤，見馮先銘，《瓷器淺說（續）》，《文物》，一九五九年七月，頁六七—七一；謝明良，《定窯白瓷概說》，載《定窯白瓷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一九八七年，頁三—六八；愛宕松男，《宋代的瓷器について》，收錄於其《愛宕松男東洋史學論集第一卷：中國陶瓷產業史》，東京：三一

2. 書房，一九八七，頁三三七—三四九。
3. 馬時雍主編，《杭州的考古》，杭州：杭州出版社，二〇〇四。
4. 秦大樹，〈定窯的歷史地位及考古工作〉，收錄於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定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二〇一一，頁五五—一七一。
5. 施靜菲，〈蒙元宮廷中瓷器使用初探〉，收錄於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十五期，頁一八九—二〇三。
6. 關於新安船年代的推定見尹武炳，〈木牌〉，收錄於《韓》文化公報部、文化財管理局編《新安海底遺物（綜合篇）》，頁二五三—二六〇；尹武炳，〈新安引揚げ文物の性格と歴史の意義〉，收錄於《東洋陶磁》第十、十一期，東洋陶磁學會，一九八四。
7. 彭善國，〈中國出土高麗青瓷述論〉，文章未刊佈，在二〇一三杭州高麗青瓷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
8. 王光堯，《明代宮廷陶瓷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二〇一〇，頁五一。
9. 謝明良，〈乾隆的陶瓷鑑賞觀〉，收錄於謝明良，《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二〇〇七，頁三九—七一。
10. 余佩瑾，〈乾隆皇帝的古陶瓷鑑賞〉，收錄於《得趣——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一，頁十四—四十。